

文章编号:1674-8107(2016)06-0005-06

如何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

马拥军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不能像西方学术话语那样靠话语霸权,而是要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来自三个方面,即内容、形式和作用。要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容有吸引力,形式上靠得住,作用上比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更大,这样在学术竞争中才能站稳脚跟,确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话语权;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 B76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6.001

如何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可以从内容、形式和作用三方面入手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在内容上必须能够吸引人,至少让人产生浓厚的兴趣;其次,在学术形式上必须靠得住,能够让人相信;再次,必须让人相信它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甚至比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更加有用,这就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有独特的优势。

一、内容:中国话语与中国经验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提升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不能靠话语霸权,而要靠内容上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外国人、外国学者要具有吸引力。我们提出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本来是为了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话语霸权。话语权的形成有三条路径,一是传统的自然而然地形成话语权的途径,即通过长期的磨合形成特定的文化认同;二是暴力的路径,通常是通过征服建立的硬的或软的话语霸权;三是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建立话语权的

路径。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权大致是通过第一条路径建立的,西方文化的话语权则是通过第二条、第三条路径或两者的组合建立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就是针对西方的话语霸权;但他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这表明,他要求建立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并不是为了用中国的话语霸权去代替西方的话语霸权,而是为了传达那些用西方话语无法表述的独特经验、“中国体验”,从而为中国话语争得本来应有的地位。中国曾经通过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学到了西方的经验,现在是到了对人类做出中国自己的贡献的时候了。用鲁迅的话说,中国的成功在于,我们采取的是“拿来主义”而不是“送来主义”,相比之下,那些采取“送来主义”的国家无一例外都失败了,所以,将心比心,中国不欢迎“送来主义”,也不会强加给西方或向其他国家输送“送去主义”,否则会遭遇像某些孔子学院那样的尴尬。中国要提升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只能通过类似文化市场上进行平等竞争的路径,不能通过建立话

收稿日期:2016-1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需要结构的生产和经济空间的扩张研究”(项目编号:14BZX014)。

作者简介:马拥军(1967-),男,山东临朐人,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语霸权的路径,不可能强买强卖。

中国古代曾经在东亚建立了一个独特的世界体系——“天下”世界,通常称为“中华文化圈”。中国古代文明中有一些概念,是无法用西方语言来翻译的,如“道”“阴阳”,如“天地”“仁”“礼”。“中”学根底比较深厚的西方学者通常直接用 Dao 这个汉语拼音来翻译“道”这个汉字,有的还作了说明:在汉语中,“道”是“首”加上“走之”旁,表示“一个头在那里走所形成的轨迹”,因此“道”代表人走出的路、轨迹或运行的规律。这是中国古代学术话语影响力的一个例子。现在,中国人走出了一条新路,中国人自己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同样无法用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加以衡量,相反,它有可能教会西方人一些东西。因此唯一的办法是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用它说明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这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学术的伟大复兴。近代以来的学术说的都是西方语言,现在中国人要教会当代学术说汉语,因为这是中国的实践,是中国人穿着自己的鞋子走出的新路,它无法用西方话语表达。习近平说过,鞋子是不是合脚,走路的人自己最清楚。建立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就是为了告诉世界,可以穿另外的鞋子走另外的路,而不是只有一条西方道路。

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天下之中国,而是世界之中国。中国通过马克思主义,已经和正在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现在比近代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自信,既包括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也包括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自信总是与开放和包容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底气不仅来自中国文化传统,而且来自马克思主义这种新传统。因此,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自我隔绝,更不意味着排外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最自然、最切近地解决自身的问题。这些理论只有解决了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才会对中国人自己产生吸引力,才能为中国人自己所理解、所欢迎,而只有中国人自己真爱真信真用,外国人才有可能爱之、信之、尊重之,因此,首先应当让中国人自己听得懂、学

得进、用得了,其次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世界影响。

二、形式:学术话语权来自学术影响力

既然中国的学术话语权不同于西方的话语霸权,那么它就只能来自学术影响力本身,而不是来自学术之外的力量。学术话语不同于日常话语,它要求精确思维,反对模糊思维。日常话语之所以属于模糊思维,是由于它的根据在于个人感觉。在生活中,人们经常说“我觉得”如何如何,“你觉得”如何如何,这些都属于日常话语。在认识论中,学术话语要表达的不是个人感觉,而是“普遍必然性”,它意味着对“所有人来说”事情的真相是如何如何,而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仅仅“对我来说”如何如何,“对你来说”完全是另外一幅样子。学术不能凭感觉下结论,而只能用概念思考。学术话语的影响力来自它的精确性、普遍必然性,而不是来自个人感觉,更不是来自强权或欺骗。中国经验未必普遍适用,但学术话语却要求“普遍必然性”,这两者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值得我们深思。

个人感觉之所以靠不住,是由于存在培根所说的“洞穴假象”,中国人称为“坐井观天”导致的假象。不仅如此,培根还揭示了人类的种族假象、通过假概念形成的市场假象和通过错误背景形成的剧场假象。必须通过批判排除一切假象,获得真实的现象,然后用固定的名词去指称它,这在学术话语中称为“概念化”(Conceptualize)过程。学术话语是通过概念、命题和推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概念同表达个人感觉的语词不同,它通过给语词下定义的方式,把所有人共同感觉到的东西固定下来。如果抽掉概念的内容,单从形式上看,那么,概念与概念的关系构成命题,命题与命题的关系构成推理,概念、命题和推理相互支撑,形成一个自洽的逻辑体系,这种自洽性就构成学术话语意义上的“有效性”(Validness)。排除假象之后形成的共同感觉在学术话语意义上则被称为“真实性”(Trueness),“真实性”加上“有效性”,才形成学术话语的可靠性(Soundness)。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学术话语的影响力来自它的可靠性。

可靠性只对于特定的学术共同体来说才成立。因此学术话语权不仅意味着影响力,而且意味着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的能力和资格。要长久地维持这种能力和资格,就必须坚持笛卡儿的“普遍怀疑”原则,其核心则是自我批判精神,只有在这种自我批判精神的基础上所探索到的因果关系才有可能可靠的。科学共同体通过检验或证伪,把这些因果关系固定下来,就成为我们所说的“科学”。学术话语权最终来自被学术共同承认的科学发现能力。科学通过教育化为常识,它的影响力不断扩展,它的话语权不断巩固。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在国际上影响力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术标准还没有确立。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学术团体,但是在这些团体中,学者们自说自话,每个人都试图把自己那种井底之蛙的感觉当作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强加给别人,不去追求普遍必然性。这根本就不是学术,这是意气之争,其必然结果是社会意识的撕裂和共识的缺乏。这正是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含义。众所周知,当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人的感觉是万物的尺度”。由于感觉各不相同,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感觉也是不同的,其必然结论就是中国人说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因此无所谓是与非。早在普罗泰格拉之后,苏格拉底就已经通过辩证法超越了这一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阶段,更不要说近代以来培根和笛卡儿对创立近代科学规范的贡献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供了逻辑推理的规则,笛卡尔提供了“无可怀疑”的前提,培根提供了“经验”,由此有效性、真实性和可靠性的科学标准才得以确立。西方的学术话语影响力,主要来自这种科学性。中国的有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却仍然停留于前苏格拉底的阶段,把学术仅仅当作饭碗,任凭屁股决定脑袋,用自己的利益来剪裁感觉,而不是追求普遍必然性的真理。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根本就没有达到“科学”的要求,怎么会有影响力呢!

马克思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当作“精神生产”,认为它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而且其规律是由同时代物质生产的规律所决定的。近代资产

阶级科学置身于市场竞争的环境,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培根为什么把假概念叫做“市场假象”,因为概念就像货币,本来应该是通用的,当人类用语词表达感觉而不是用概念表达思维的时候,概念就变成了假概念,就像市场上的货币变成了假币一样。苏格拉底的对话术或辩证法,正是要确立概念的地位,他要求“用概念思维”而不是“凭感觉下结论”,这正像在市场上确立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地位一样。这就意味着,西方的话语霸权只有一部分来自物质生活的生产力,另外的部分即主要部分是来自它的精神生活的生产力。中国要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首先必须建构精神生产的秩序。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打人的棍子。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提供质优价廉的精神产品,而不是提供过度包装的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在精神生产的秩序确立之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如何在学术研究中站稳脚跟呢?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不应当急于捍卫自己,攻击别人,而应该像苏格拉底那样,在对话中先假定别人是正确的,然后运用逻辑的力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可能有人只注意到苏格拉底的“反证法”中批评的力量,从而仅仅从器物甚至是技术的层面来理解对话术(dialectic,即辩证法),忘记了苏格拉底“我只知道自己无知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从而忘记了对话术作为主观辩证法还蕴含着“逻各斯”或“道”的层面。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把辩证法发展到“客观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获得了“历史科学”意义上的真理性,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来源。因此,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首先需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品格和科学精神。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于批判精神,这一讲法只有在康德“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相比于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精神是自我批判精神。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就说过,哲学是一把双刃剑,一面对世界,一面对批判者自身。后来马克思又说,正如实践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一样,理论应当是对世界的批判和人

的自我批判的一致。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不是由于它的话语霸权,相反,在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来自她那无法被强权遮盖的真理光芒,包括它的形式上的有效性、内容上的真实性和理论体系的可靠性。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不应该再满足于制造和传播那种山寨版的马克思主义,更不应当单纯站在“为稻粱谋”的狭隘立场上,搞“文人相轻”的那一套,而应当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三、作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

本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大优势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遗憾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水平太低,不仅低于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低水平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不相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解决了挨打的问题,而且解决了挨饿的问题,这在实践中是两项重大的成就。目前中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表明除了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但中国的伟大成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取得;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中国还有大量需要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学习的地方。中国不能满足于做行动的巨人、理论的侏儒。为了改变这种理论与实践不相称的局面,目前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标准。

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被鸦片战争打断以后,曾经长期被发展过程中的“后发劣势”所压制。后发劣势既有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的原因。内部原因随国情有所区别,外部原因是共同的,正如韩裔英国学者张夏准所说的那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它们不愿意其他国家超越自己,因此在自己发展起来以后“抽掉了梯子”。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这些原因,这就是内部的封建主义和外部的帝国主义,因此要建立后发优势,首先必须通过反帝反封建,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政权,只有

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够实行“拿来主义”,形成后发优势。在这一意义上,不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且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建设好中国。正是马克思主义接续了被打断的中国历史,帮助中国获得后发优势。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制高点上,中国才能够吸取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要经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些经验化为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选择。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超出西方发达国家水平,是完全可能的。这不仅由于中国学者有中国经验作为研究内容,而且由于我们有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的形式。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科学”的研究范式,它在所有方面都高于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潜力尚未被中国学者发掘出来而已。迄今为止,中国学者所谈的“唯物辩证法”还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内部的一种教条,尚未转化为学术标准。按照我的理解,中央政治局先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后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正是由于这里的“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要求的研究方法,即唯物辩证法。

所有科学的研究目标都是获取相应的因果关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四因说,即形式因、质料因、目的因和动力因,近代科学作为实用科学或手段科学,只保留了质料因和动力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科学恢复了目的因和形式因,从而重新创立了韦伯意义上的那种“价值科学”。正如有学者所注意到的那样,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往往是线性的因果关系,因而片面强调客观性;只是到量子力学等当代自然科学,人们才重新注意到“反身性”的存在。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辩证法意义上的因果性既不是休谟意义上的因果性,也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因果性,而是实践意义上的因果性。休谟和康德意义上的因果性是基于知性思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既是又不是”或“既不是又是”。实践意义上的因果性则是与“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在特定的实验室条件下,特定的原因会出现特定的结果;如果特定的结果没有出现,而原因却具

备,那就说明一定是不具备相应的条件。这就是说,实践从肯定和否定两方面保证了因果关系的可靠性,而人类正是通过提供或去掉特定的条件,来利用科学改造世界的。这就是说,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使真理“成其为”真理的唯一标准。

如果说,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遵循的是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科学所遵循的则是辩证逻辑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形式逻辑只能表现从“是”到“是”或从“否”到“否”的线性因果关系,辩证逻辑才能表现“是”与“否”、肯定和否定相互作用的双重因果关系,即列宁所说的作为“网上纽结”的因果关系。只有建立在辩证逻辑规范上的形式有效性,才能容纳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内容真实性,以此为基础形成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范式的可靠性。

唯物辩证法(dialectic)的范式本质上是一种对话(dialogue),它立足于对立面的统一;而作为形式逻辑,知性科学即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范式本质上是一种独白,它追求的是抽象普遍性。长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恰恰是用知性科学的范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的,比如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就是这样一种科学范式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明确地反对把他们的学说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认为这陷入了黑格尔式的普遍历史哲学。他们认为,历史不过是人的活动而已,因而“历史科学”只能是一种实践的科学,它代表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因此反映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客观规律”,而是人的活动的客观规律。在他们看来,脱离人的活动,客观规律至多不过是一种客观的假象。客观性不等于真理性,只有对特定主体来说的客观性才等于真理性。

按照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标准,你是不可能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研究对象的,正如用西方哲学、西方经济学和西方政治学是不可能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样。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社会,按照黑格尔的标准是一个异化的社会,

通过形式逻辑的有效性过滤过的事实,只能是无矛盾的事实,而不是自相矛盾的事实,因此在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那里,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经过简化甚至美化的社会,人们不可能看到资本主义的真相。只有像《资本论》那样从否定的方面,或者从资本主义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方面,才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自相矛盾的,“矛盾,然而事实”。西方人对中国的预测为什么会一再失败?为什么这么多人对中国看不懂?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科学范式容纳不了矛盾,而只会把矛盾着的研究对象过滤掉。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正是矛盾的自我否定构成哲学社会科学规律意义上的“客观性”。作为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站在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历史制高点上。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从后思索”的方法,把通过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而得到的共产主义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因此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共产党人都是探索者,是先锋队队员,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的民主革命,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用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原理来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又能够自主地决定中国的发展道路,才能够把“后发劣势”改造为“后发优势”,才能够在吸取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同时,不至于走向自我迷失,这既同崇洋媚外、也同盲目的排外主义划清了界限。

总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在内容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深厚的基础。但是从形式的可靠性来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却处于极为不利的学术地位。不改变这一地位,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尤其是学术共同体,目前大多都是按照官僚机构的模式建构起来的,违背了学术共同体发展规律,它更容易形成话语霸权,而不是通过话

语竞争自发形成话语领导权。今后相关主管部门应当认真研究学术发展的规律,按照学术要求而不是行政事业单位的标准来管理学术共同体,破除

学术共同体中的话语霸权行为,建立竞争性的学术话语评价机制。这对学术管理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How Should China Strengthen Its Academic Influence and Right of Speech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MA Yong-jun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academic right of speech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cannot be realized through discourse hegemony, as what the Westerners have done, but through the influence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ountry's academics itself. Such influences and competitiveness come from academic contents, forms and func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ttractive contents, reliable forms and rich functions, so that China's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academics will survive the competition and gain their right of speech and influences.

Key word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discourse; right of speech; influences; content; form; function

(责任编辑:刘伙根)